

後周魯時代的 天下秩序

佐藤將之

著

《荀子》和《呂氏春秋》
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

 臺大出版中心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本著作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後周魯時代的 天下秩序

《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

佐藤將之
著

目次

作者序	iii
序論	1
一、本書目的	1
(一) 《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登場的歷史 背景：「後周魯時代」	2
(二) 《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目標： 提出「治理天下」的藍圖	4
(三) 《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共同思想 特質	9
二、本書內容和研究方法	13
三、本書架構	15
第一章 《荀子》和《呂氏春秋》比較研究之可能性	23
序言	23
第一節 「綜合」還是「統合」？《荀子》和 《呂氏春秋》的研究觀點之「非對稱」性	25
第二節 過去《呂氏春秋》研究的三條脈絡	27
第三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思想關係論	42
小結	47

第二章	「後周魯時代」的開始與欲升天子的秦王	51
	序 言	51
	第一節 秦國從「霸王」到「滅周」之路程	53
	第二節 「後周魯時代」的秦王：為了升為「天子」的嘗試	56
	第三節 嬴政時期的秦國對外政策	59
	第四節 「後周魯時代」的結束：往攻滅六國政策的轉換	66
	小 結	71
第三章	「後周魯時代」的秦國與《呂氏春秋》的登場	73
	序 言	73
	第一節 秦國推動《呂氏春秋》的撰寫之背景和契機	75
	第二節 呂不韋編輯《呂氏春秋》的目的	78
	第三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思想之間是否有影響關係？	85
	小 結	92
第四章	治理天下人民的倫理學說：《荀子》與《呂氏春秋》的「誠」與「忠」概念	95
	序 言	95
	第一節 《荀子》「誠」概念的思想特色	98
	第二節 《呂氏春秋》「誠」概念的思想特色	103
	第三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忠」概念的思想特色	120

小 結	123
第五章 「人類相同」思想之展開： 《荀子》與《呂氏春秋》的「人」觀與「群」論	129
序 言	129
第一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人」觀	130
第一項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 「性」、「情」、「欲」三概念	132
第二項 《荀子》和《呂氏春秋》思想中的「人」	138
第二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養生」論	144
第三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群」論	148
小 結	153
第六章 《荀子》與《呂氏春秋》「同類相應」和「染」的 思維方式	157
序 言	157
第一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中以「類」概念所 呈現的思維方式	159
第二節 《荀子》的「漸」概念和《呂氏春秋》的 「染」論	172
第三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禍福論	175
小 結	184

第七章	體現秩序的原理與其落實於人類世界：	
	《荀子》與《呂氏春秋》的「理」和「公」概念	187
	序 言	187
	第一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理」概念	190
	第二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公」概念	194
	第一項 過去對《荀子》和《呂氏春秋》「公」概念的相關研究	195
	第二項 《荀子》的「公」	204
	第三項 《呂氏春秋》的「公」	214
	第三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理」和「公」概念的思想意義	226
	第一項 《荀子》和《呂氏春秋》「理」和「公」概念的異同	226
	第二項 《荀子》和《呂氏春秋》思想中「理」和「公」概念之間的關係	229
	小 結	233
第八章	《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天下」概念：	
	「後周魯時代」世界的地理和統治範圍	235
	序 言	235
	第一節 過去學者對中國「天下觀」研究的貢獻和限制	236
	第二節 《荀子》的「天下」概念	247
	第一項 《荀子》「天下」一詞用法上的特色	248
	第二項 《荀子》「天下」概念的思想特色	253
	第三節 《呂氏春秋》的「天下」概念	267

第一項	《呂氏春秋》「天下」一詞用法上的特色	267
第二項	《呂氏春秋》「天下」概念的思想特色	270
第四節	《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觀」之間的異同和思想意義	275
第一項	《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觀」之間的異同	275
第二項	《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觀」的思想意義	277
小 結		283
結 論		285
一、	本書探討所得若干見解	286
二、	《荀子》對秦王未來成為「天下之君」的看法	290
三、	戰國時代的終結和《荀》、《呂》兩書對當時世局的思想角色之結束	294
附表		299
參考文獻		323
一、	傳統文獻	323
二、	中、日、韓文近人著述	326
(一)	專著類	326
(二)	論文類	333
三、	英文近人著述	343
(一)	專著類	343

(二) 論文類	344
四、網路資源	345
索引	347
人名索引	347
語詞索引	355
文獻索引	368
跋	377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圖 表 目 次

圖 1	前 316 年前後孟子晚年的中原諸國	8
圖 2	前 250 年前後周朝滅亡直後的中原諸國	8
表 1	《荀子》中「誠」字重要用例（除〈不苟〉11 例與「誠信」5 例）	299
表 2	《荀子》「誠信」和「端誠」之用例	300
表 3	《呂氏春秋》「誠」字的概念化用法	301
表 4	《荀子》「忠信」與其他重要道德概念之搭配	302
表 5	《荀子》「忠信」用例中與統一「天下」有關的詞彙	303
表 6	《呂氏春秋》「例證」中的「忠」概念	303
表 7	先秦西漢主要文獻中「類」字出現總數	304
表 8	《呂氏春秋》對《周易》經文的引述	305
表 9	先秦文獻中「理」字出現的情形	306
表 10	《荀子》中主要觀念字出現次數	306
表 11	《荀子》的「理」字用例	306
表 12	《荀子》中「文理」概念之用例	311
表 13	《呂氏春秋》的「理」字用例	312
表 14	《呂氏春秋》中「理」的重要具體例證	314
表 15	《呂氏春秋》〈過理〉中「理」的重要具體例證	315
表 16	《呂氏春秋》的「理義」用例	315
表 17	《呂氏春秋》的「義理」用例	315

表 18 《呂氏春秋》同一論述中「理」和「義」分開出現的
用例 316

表 19 《荀子》的「公」概念 316

表 20 《呂氏春秋》的「公」概念 318

表 21 《荀子》和《呂氏春秋》「天下」概念的賓語用法比較 319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序 論

一、本書目的

本書藉由歷史學、政治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以及所謂「觀念史／概念史」等各種研究途徑之互相參照，試圖綜合探討《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撰寫目的和思想內容。筆者期盼闡明兩書對當時戰國世局的歷史上之固有思想意義。本書針對兩書及相關文獻，如《史記》和其他戰國諸子文獻等內容，將加以比較嚴謹之「觀念史／概念史」分析，欲提供如下三個觀點：第一，《荀子》和《呂氏春秋》之出現應該以由在戰國最後階段的西元前256年¹所發生周、魯兩國之滅亡而出現的「後周魯時代」為主要契機。²第二，在如上歷史背景為主要契機而誕生的兩書，其政治哲學的目標應該在於構想能夠治理全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建立。第三，就兩書的思想特色而言，除了其「綜合性」特色之外，思維及論述內容上還呈現出不少共同思想特質。

因為如上所列的三個論點將在本論各章展開詳細探討，以下序論僅將概述其要，其旨在於先提出筆者問題意識和探討的出發點之輪廓，以期有助於讀者較容易掌握本書理路之要。

1 本書表記戰國時代紀年時只加「前」，省略西元二字。

2 不過，思考前256年所發生周、魯兩國之滅亡「影響」，或「促成」《荀子》和《呂氏春秋》兩書之出現時，周、魯兩國之滅亡所影響的是「其思想的形成」，還是「其內容的撰寫或完成」，應該要分開理解。若我們思考此兩書思想所代表的年代，《荀子》的思想內容應該也包含前256年之前提出的不少論述；《呂氏春秋》則應該是前256年所發生周、魯兩國的歷史事件本身，為直接的撰寫契機。但這點並不否定此主張內容包含前256年之前由其他戰國諸子，即呂不韋所邀請撰寫的學者已主張的可能性。

(一)《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登場的歷史背景： 「後周魯時代」

不可諱言，《荀子》和《呂氏春秋》兩書的思想內容反映出荀子和呂不韋所活動的戰國時代晚期——大約前三世紀前半——的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情況。然而絕大多數的學者由於過度意識到前221年由秦國統一華夏世界的歷史事件，往往在理解兩書思想的內容和意義時，反而依據《荀》、《呂》思想形成之後的歷史事實。換言之，許多學者的眼界之中，兩書思想的內容和意義，通常與於前221年由秦國「天下一統」的歷史事件密切聯想。在此理路上，與其他戰國諸子的著作相比，兩書的思想被視為受到更為濃厚的「中原世界將會一統的歷史趨勢」影響之著作。³

如本書將詳細探討的，兩書思想確實含有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志向。然而，當我們設想「《荀》、《呂》志向於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建立」時，需要注意的是荀子的撰寫也好，呂不韋的編輯也好，都是他們正在思考或主張兩書內容時的前240年代時間點，當時的秦國應該實際上還沒有「準備好」馬上邁進於「天下一統」。理所當然，荀子和呂不韋也都尚未知悉中原世界從此二十年後將會由秦國「一統」。更何況，荀子本人豈能預料到此舉將由他的弟子李斯來推行呢！再說，我們所需要關注的時間點，就是荀子和呂不韋兩人正在活動的前250至前240年代，此時離後來由秦國一統天下的前221年，還有二十到三十年。若將視點放在前250至前240年的華夏世界，荀子和呂不韋兩人針對他們所面對著的當時歷史情況所深深感受的反而應該是，當時天下分裂的狀況相當嚴重，於

3 由於「天下一統」一句為《史記》李斯的話語所出現。這裡所說的「一統」只係指中原世界建立當時存在戰國諸侯之間的新天下秩序之謂；與後來秦王嬴政和李斯後來達成「一統」的過程和結果大不同。請看下文。

是他們努力提出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理論，以便提供有資格或有志推行此舉的統治者。

由此觀之，依筆者來看，對《荀》、《呂》思想過往之相關研究，過度注視於兩部著作的撰寫時期與其他諸子的文獻相較，接近於秦國一統天下的前221年之事實；而從這點逆向推測兩書的構想，就如同秦國後來達成那樣的天下一統。假設我們仔細比較兩書所提出「治理天下」的藍圖，和秦王嬴政和李斯所推行天下一統的想法之間，就存在很大的差別。前240年代的時間點，荀子和呂不韋不可能知道未來二十年後，中原世界將由嬴政和李斯統一。反之，嬴政和李斯他們一統天下的藍圖，可能則是先學過《荀》、《呂》內容後所提出。即便李斯接受兩書內容，並在此理解的基礎上提出他本人的建策，李斯也應該修正了兩書許多論述內容，甚至要克服其構想本身的思想限制。畢竟，到前230年後半，除了韓國之外的戰國諸侯們，似乎都還不願永久臣服於秦廷。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下，為何前240年代的時間點，荀子和呂不韋還能提出相當具體的治理天下之藍圖呢？到此有令筆者想起的重要歷史事件。這就是前256年，亦即周赧王五十九年這一年，周朝被秦昭襄王征服的歷史事件。當時擁戴赧王的西周君將三十六城邑和三萬住民通通「獻」給秦昭襄王。不久赧王駕崩，昭襄王便將周室九鼎搬移到秦都咸陽。其實，此年還有一件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擁有「郁郁乎」周初遺制之魯國也被楚國征服，魯國末代君主頃公被遷移至莒邑而死後絕祀。由於從周、魯滅亡的前256年直到秦國最後征服齊國的前221年之間，還有三十五年，這意味著華夏文明在戰國時代的最後階段，仍經歷三十五年之久的政治權威空白時期（interregnum）。

值得注意的是，秦國兼併西周並將九鼎搬移至咸陽之後，昭襄

王於前254年要求中原諸侯來朝秦王，過程中還對遲到的魏國派兵問罪。次年前253年，昭襄王親自到雍祭祀天帝。還有〈秦始皇本紀〉載錄「異日韓王納地效靈，請為藩臣」一句，其中「異日」一詞，文脈上係指「天下一統」之前的時期蓋無疑。⁴此句的意思就是，到了秦王嬴政的治世時期當時韓王已臣從秦廷。由此觀之，從前256年「滅周」開始，昭襄王到嬴政的歷代秦王似乎在此政治權威「空白」時期，已經意識到自己成為「*de facto*」（實際發揮天子角色）的天下之君，而藉此勢位開始與其他戰國諸侯互動。

關於荀子和呂不韋的思想活動時期，從兩人於歷史舞台退場的時間（前238至前235年之間）來看，《荀子》的思想應該在前260至前240年代屬其圓熟時期；《呂氏春秋》的內容則反映其具體撰寫時期的前240年代天下世局以及呂不韋他們對此的看法。如下所詳論，根據《史記》等相關文獻記載，前240年代的時間點就是秦國單獨的國力已達到能與其他六國之綜合抗衡，而意味當時戰國諸侯國已幾乎不可能單獨或二、三國合縱來對抗秦國。在此秦廷應該開始意識到如何將自己提升為治理天下的國家之君王。同樣地，當我們解讀《荀》、《呂》對天下形勢的敘述，也應該注意兩書作者也相當意識到上述中原世界在「秦國獨大」的情形，但同時也注意到其「獨大」的秦國尚未藉此能一下討滅其他六國。這就是中國古代前250至前240年代，「後周魯時代」繞著秦國政治環境的情勢。

（二）《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目標：

提出「治理天下」的藍圖

倘若設想《荀子》和《呂氏春秋》的主要內容會反映上述前256

4 以上諸例將在本書第二章第三節詳論。

年發生的周朝和魯國滅亡，我們便不會有很大的困難推測《荀子》和《呂氏春秋》問世的主要動機，應該在於兩書均要提出「後周魯時代」天下新秩序的構想。《荀子》和《呂氏春秋》之間，關於主要將以誰（秦王或其他諸侯）來擔任此新秩序落實於中原世界的態度的確有不同：主要為秦廷撰寫的《呂氏春秋》，理所當然具體預設或期待秦主能擔任未來治理天下的君王（「天子」）；《荀子》則將這樣的君王稱為「聖王」、「後王」、「帝王」等，並將成為如此君王的可能性開放給具有「方一·百·里」以上的領土之全部諸侯。⁵然而兩書針對此未來統治者所治理的對象和範圍，均從頭預設當時華夏世界實際能夠治理全部的領土和人民。若我們關注這樣兩書理論的共同點時也便會發現，兩書的政治哲學與戰國其他諸子的相關論述不相同之處，有如下三種特質：第一，兩書在論述的前提上，也預設人類都屬於同類。因此，即便兩書的作者們都承認當時戰國各國通用的語言之間可能會產生無法溝通的情形，甚至是居住於華夏文化圈之外的人民恐怕其生活規範根本就與居住於中原的人民不同，但都基於「人類都屬於同類」的前提而展開治理整體華夏世界的國家是實際可能的。第二，兩書具體描述為了治理天下的國家制度和其運作的藍圖。第三，兩書明確有「治理天下之君」的形象（image），並且均努力向當時實際存在的國君們說明，為了將自己提升為「天下之君」，應該實踐什麼。⁶

5 關於這點，將在本書第八章第二節詳述。

6 關於這點，如本章闡述，由於《呂氏春秋》是為了提供秦廷撰寫，其預設「治理天下之君」為「秦王」，這點毫無疑問，只是至少理論上也不會排斥其他國君提升為此地位。相形之下，荀子則從頭到尾採取開放的態度，關於他心中的理想帝王形象，筆者曾分成四個成分來詳論。請參閱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其實，《荀子》主張「禮義」的實踐就是為了提升「天下之君」的不二法門，某種意義上對「天下之君」的說明在戰國時期的相關論述中最具體且明確。請參閱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特別是第五章第二節「『禮』之實踐與理想社會的實現」相關論述（頁346-392）。

討論到此，一些讀者或許認為其他戰國諸子也構想過治理天下的藍圖。當然，筆者並不否定如下所舉冠上戰國諸子名稱的文獻中，含有治理天下相關問題的許多論述。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除了這些所謂「戰國」文獻中相關治理天下的許多文段很有可能是秦漢時期所撰或重寫，甚至被插入的可能性之外，還在如下兩個意涵上，兩書所提出治理天下的論述，與其他相關文獻中的論述具有屬於不同層次的差異。到此無妨考察一番《荀》、《呂》所提出治理天下的論述和主要思想內容，與兩書之前戰國中期所形成思想文獻之間的兩點差別。

第一，主要思想應該屬於戰國中期的思想文獻中，其實也時常談到「天下」或某種程度上的「天下之君」，但論述的實際關懷通常是針對以諸侯國為基本單位的一個國家之制度和運作層面。關於這點，大家所熟悉的戰國諸子之政治論，如《商君書》、《管子》、《慎子》、《黃帝帛書》⁷等書，以及甚至是比《荀》、《呂》兩書稍後撰寫的《韓非子》論述中，其前提都是從一個國家出發。在這些文獻中，展開與治理天下相關的議題，很多是回顧古代理想統治的情形，如黃帝、堯舜等，以敘述這些君王曾經治理過天下的方式出現。因此，正如《黃帝帛書》中「經法」諸篇相關論述的例子，這些文獻的作者理論出發點是在於當時以複數戰國諸侯國並存的情形為大前提，其通常針對其中一國如何成功增強其國力，而克服或打敗周邊諸侯國的議題上展開。⁸而「十六（大）經」部分中論述治理

7 《黃帝帛書》是在1972至1974年由湖南省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文獻群之一，正式名稱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後來許多學者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黃帝四經》比定。本章則保留此文獻是否與此《黃帝四經》的比定問題，而暫稱《黃帝帛書》。

8 關於這點，《韓非子》諸篇之論旨是關於如何防止國家滅亡，或如何保護現存王室的統治權，而這樣的危機意識與本書所展開《荀》、《呂》兩書的問題意識和構想非常遠。

天下的問題，則都是藉以回顧「黃帝治世」的場面來展開。

不可諱言，《荀》、《呂》的確也包含如何治理當時戰國諸侯國規模的一國之豐富論述，然而兩書對治理某個國家的論述中，即便表面上似乎專論特定一個國家的國內情況，荀子和《呂氏春秋》作者們視野背後所通貫其論述的終極關懷，還是「如何治理天下」。

第二點的差別在於與其他戰國諸子文獻中「天下」一詞的使用情況有關。其實，與此相關耐人尋味的情形是，在與上列諸子不同戰國文獻，如《墨子》、《孟子》、《老子》、《莊子》（其中比較能代表戰國思潮的內容部分）等論述中，「天下」一詞出現得非常多。正如安部健夫對「天下」概念的著名研究，這種情況會引導讀者推測，這些文獻的作者們也抱著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志向。⁹ 眾所周知，《孟子》〈梁惠王上〉所記錄，孟子向梁襄王說道「天下……定于一」，而此句中我們可以得悉，孟子確實懷抱天下向「定于一」的強烈欲望，而且從相關篇章的發言所悉，孟子很期盼齊宣王能夠達成此理想。

然而我們也需要注意，孟子在〈梁惠王下〉將當時天下的勢力做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的分類，在此勢力分割中，孟子應該最期盼推動「定于一」的齊國之勢力，其實只占孟子所設想的「天下」之九分之一而已（圖1、圖2）！天下中只有「九分之一」的齊國的情況，豈能與秦國的領土已「廣大乎舜禹」（《荀子》〈疆國〉）的半世紀後情形同日而談？¹⁰ 因此，孟子也了解，就他生活當時的

9 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念——政治思想史の試論》（京都：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1956），後收入於氏著：《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頁425-526。有關戰國諸子文獻「天下」一詞出現的情況之詳細探討，請看本書第八章第一節。

10 《孟子》「天下」視野與《荀子》的比較上還有顯著差異，即整本《孟子》「統」字只出現在〈梁惠王下〉「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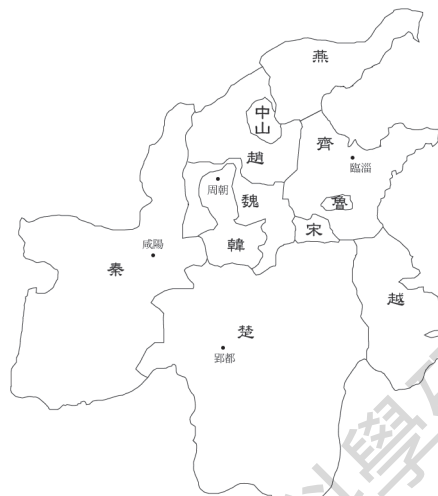


圖1 前316年前後孟子晚年的中原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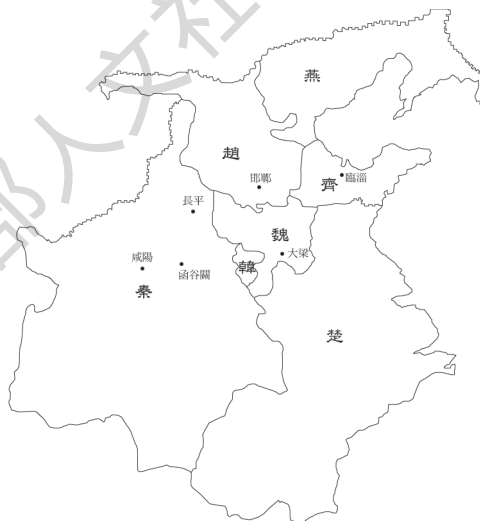


圖2 前250年前後周朝滅亡直後的中原諸國

情況而言，孟子所稱的「定一」之具體目標，最多就是自己也說出的「朝秦楚」（〈梁惠王上〉）的程度。換言之，孟子當時從如宣王治下的齊國角度所設定之國家目標，其實只能迫使如秦、楚等當時屬最強悍的國家之君不得不向己朝拜的程度而已。由是觀之，此種「定于一」並不會超過修辭性（rhetorical）的主張，而不可由此想像如後來嬴政和李斯所推進「天下一統」般的情形。孟子在此要主張的重點，應在於由一個強國的諸侯假設能實行「仁政」，他的國家將能吸引周邊國家的人才和民眾，由此可成為其他國家不能抵抗的「王者」，這樣的國家並將使得「秦、楚」等其他強國也來朝拜。¹¹

（三）《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共同思想特質

《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以前256年之後，周天子已不在中原世界的世局為主要背景而撰寫或編輯，其思想的主要內容則是為了治理天下人民的政策綱領。也就是說，兩部著作所出現的第一歷史意義，在於提供建立「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為了闡明此兩本著作的思想特質，筆者先將構成《荀子》和《呂氏春秋》各種思想的（尤其是後者的）學派歸屬問題放進括號。假設按照如上觀點來重新比較分析兩書所選擇的議題、使用術語、引述比喻、展開論述的理路和結構等，將能發現許多相同或類似之處。關於其具體內容將在本論中詳論，在此只述梗概。筆者想提出的有四點：

首先，如學界所熟悉，《荀》、《呂》均為綜合戰國諸子思想的著作，而正如筆者過去研究所闡明，荀子吸收之前諸子思想之成分，如《墨子》「兼愛」論、《莊子》「道德」論等論述後，由荀子

11 與此相關，若此「仁政」的實行者為如滕國等小國國君，孟子提供很實際的回答。（梁惠王下）即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關於孟子和荀子「天下」觀之間的異同，本書第八章第二節提供較詳細的探討。

自己的「禮」論中統合，而在論述格局中展開「『禮』是為了達成戰國諸子曾經提倡過的德目或理想境界最好的方法」之核心主張。¹² 相形之下，《呂氏春秋》思想的「綜合」問題，在《漢書》〈藝文志〉的記載以來，其思想內容被歸類於「雜家」；由此關於所謂「主導《呂氏春秋》核心思想」的問題，則被「戰國諸子中哪一家思想最為優勢」的探討方式占據長期以來的研究主流。¹³ 然而，筆者近年研究中則提出：其實《呂氏春秋》許多論述內容，在志向於符合實踐「理」或「理義」的目標上，保持高度的思想統合。¹⁴ 本書探討中，筆者將進一步觀察《呂氏春秋》的作者們也由其他概念的使用上（如「公」概念等），試圖保持其主張立場和論述目標的一貫性。

第二點則在於《荀》、《呂》思想的思維方式上之特色而言。兩書的作者均在如下三種思維方式進行論述：第一，世界萬物一切屬變化過程；第二，「同類相應」或「同類相引」；第三，人類都屬於同類。不可諱言，關於這些思維方式上的特色，若我們關注其中一個，譬如「世界萬物一切屬變化過程」的世界觀，這不一定只在《荀》、《呂》所凸顯；或許此種思想特徵在《莊子》和《周易》〈繫辭傳〉等論述更為顯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書如上三種思維方式上，常常在如何治理天下或天下人民的論述出現，並且發揮其主要思想功能。譬如說，「世界萬物一切屬變化過程」的觀點使得治理天下的君主需要具備「應變」（《荀子》）、「知化」（《呂氏春秋》）的能力。¹⁵ 同樣地，「人類都屬於同類」和「同類相應」的觀

12 這點是貫通拙著《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的主要觀點。

13 關於《呂氏春秋》所謂學派歸屬問題的探討，筆者在本書第一章提供詳細的考察。

14 關於其詳細討論，請參閱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頁 180-214。

15 關於這段的詳細討論，請參閱佐藤將之：〈掌握變化的道德——《荀子》「誠」概念

點，在《荀》、《呂》中針對如何達成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的議題展開論述時，便構成其實踐可行性的理論根據。¹⁶

第三，其實上述的思維方式層次上互相類似的情形，也在《荀子》和《呂氏春秋》所使用的概念意涵之相似性中呈現出來。假設按照筆者過去研究為了理解戰國時代思想演變的分段性特色，所提出「倫理主張」(ethical argumentation)和「分析論述」(analytical discourse)的發展模式，來理解《荀》、《呂》之思想特色，「倫理主張」的思想特色中，兩書都重視「仁」、「義」、「忠」、「信」、「孝」等倫理性德目；而在「分析論述」的特色中，則均不忽略「治／亂」、「分」、「法」等實際運作國家機構的諸概念。正如筆者前書所曾經詳論的，這些概念是戰國中後期的思想家們，如慎到等齊國稷下學者所提出。他們藉由驅使這些概念，分析國家興亡的法則。而兩書則是在積極回答如上於他們之前的思想家們所提出各項問題的同時，還將原來戰國中期的思想家為了論述一個國家層次的問題擴及治理天下的層次的問題上，展開其論述。

不但如此，《荀》、《呂》均重視如「仁」、「義」、「忠」、「信」、「孝」、「誠」等構成「倫理主張」的主要概念，在之前儒、墨兩家的著作中也受到重視。同樣地，「治／亂」、「分」、「法」等「分析論述」常出現的術語，則在慎到、《管子》、《商君書》，甚至《韓非子》中也都受到重視。不過，至此值得注意的是，《荀》、《呂》不但重視如上所舉的諸概念，還為了提出兩書的獨特觀點而使用這些概念。譬如，針對「忠」概念的提倡上，兩書的作者相當知悉稷下學者和戰國道家的相關論述中，以「忠臣常被他的主上懷疑甚至殺戮」的例子來進行批評。而兩書在「忠臣會被殺戮」

的結構》，《漢學研究》(集27期4，2009年)，頁35-60。

16 關於其詳細考察，請參閱本書第六章。

狀況會發生的前提下，還主張「忠」對國家安定的極為重要。對「忠」概念這樣的論法在戰國早中期的論述中完全不出現，而是僅在《荀》、《呂》所展開的論述方式。

同樣地，如上所提及，《荀》、《呂》均重視「理」和「公」兩個概念，其在《黃帝帛書》、慎到以及《韓非子》的論述中也受到重視。不過，與此三者論述中的用例相比，在《荀》、《呂》有關「理」和「公」的論述所觀察到的顯著思想特色是，兩者將「理」和「公」概念作為達成某種「秩序」狀態的概念來使用，不過另一方面，兩者的論述中，「理」和「公」概念也同時呈現相當濃厚的倫理價值。「理」和「公」概念這樣的倫理意涵在《黃帝帛書》、慎到以及《韓非子》則很少呈現。

第四點是與《荀子》和《呂氏春秋》所提倡的政治哲學之可實踐性相關。如上所述，兩書的思想均由以治理天下人民為主要理論目標的論述而構成，而且其論述亦含有對戰國諸子百家所提出各種理論之回應。眾所周知，戰國中期（到後期）如《道德經》（或許當時被稱為《德道經》）、《莊子》、《管子》「四篇」等所謂道家文獻展開的論述，都提出如「道」、「一」等相當抽象的概念。同樣地，戰國名家和墨家也展開如「名實」論等相當複雜的理論性考察。荀子和《呂氏春秋》作者們不可能不熟悉他們之前戰國諸子所主張的理論之抽象性和複雜性。然而，《荀》、《呂》兩書無論如「忠」等倫理上的德目也好，或如「理」、「公」等原來富有理論性的概念也好，基本上都是為了實際治理天下的議題，而將這些抽象且複雜的論辯內容轉換成富有可實踐的論述，以期讓當時王公朝臣們在實際生活中都能夠實行。這樣的轉換過程中最為顯著的例子是《荀子》所提倡的「禮」概念。《荀子》在「禮」概念的運用中，將戰國諸子為了治理天下人民所提出的理論性問題，放在實踐層次上而獲得

解決。¹⁷

其實，在此意涵中，《呂氏春秋》雖然表面上並不提倡「禮」本身的重要，但如其在〈十二紀〉相當明顯地呈現，《呂氏春秋》敘述天子在每一年（特別在各季節儀禮）的居住言行。不可諱言，〈十二紀〉的作者們一一說明秦主在「年中行事」中應如何舉動的宗旨，並不只是為了告知秦王如何舉動。秦主需要如此舉動的第一意義，應該在於秦廷為了正確對應「周天子並不在」的當今狀況。換言之，周天子不在的情況下，身為「新天子」能正確扮演原來周天子應該要執行的角色，反而成為秦主提升為「天下之君」的第一步。而且在《呂氏春秋》作者們的視野中，讓秦王和秦廷朝臣理解這一點，亦是為了秦國達成周邊諸侯和天下人民會親附秦主之實際且最具體的治理方法。如此，〈十二紀〉的相關敘述將戰國諸子所提出各種治理國家的理論，相當成功地轉換為讓實際生活在人間的君主也能實踐的準則指南。

總之，《荀》、《呂》兩書治理天下的理論在實際生活能夠實行，其顯現彼此的相似性；而與如向一般水平的君主動輒要求「執道」等，在生活上難以實踐的心術論所要達成治天下的道家理論，則有顯著的差別。

二、本書內容和研究方法

為了分析《荀子》和《呂氏春秋》如上所述的思想特色，本書論述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筆者對於過去學者對《呂氏春秋》的思想歸屬和兩書之間關係的相關問題之評述。第二部分則試論《荀》、《呂》之出現，應該以戰國最後階段之前256年所發生周、魯

17 請參見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第五章，頁321-392。

兩國的滅亡而出現的「後周魯時代」為主要契機。占本書約三分之一論述的第三部分，則是基於較嚴謹的觀念史／概念史之研究途徑¹⁸，藉由分析兩書出現的各種概念、相關句子、論述理路等內容，試圖呈現《荀》、《呂》之間的思想特色。下面則針對本書將具體如何找出《荀》、《呂》之間的思想成分的問題，說明筆者的研究方法和論述方式。

依筆者理解，《荀子》和《呂氏春秋》中能夠觀察彼此類似的思想特色者，主要在如下四個議題的相關論述：第一個議題是《荀》、《呂》均重視廣義之倫理道德相關論述；第二個議題是為了建立能涵蓋全天下的國家的論述之前提或基礎，而提出的「人」論或人類觀；第三個議題是與為了說明將「秩序」狀態如何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問題相關；第四個議題是如何建立全人類的單一國家，即「天下型國家」相關問題。¹⁹《荀》、《呂》對如上四個預設性議題，通常是由與「誠」和「忠」（倫理觀）、「人」和「群」（人類觀）、「公」和「理」（秩序觀）、以及「天下」（天下觀）等概念一起被探討。換言之，若我們闡明兩書如上所列諸概念之涵義及其構成的相關論述，也許便能呈現《荀》、《呂》思想特色以及對當時歷史趨勢之思想角色。

那麼，在此研究作業當中，筆者所採取對戰國諸子文獻之分析方法，是譬如在《荀》、《呂》兩者的相關論述之間，若發現有較大思想差異，筆者不會將其簡單歸類於學派上的差別（譬如，按照「《荀子》中A的主張淵源於儒家，《呂氏春秋》中B的主張則來自法家」方式的說明），而是盡量就兩書論述內部的用詞和理路中，

18 筆者對所謂「觀念史」研究途徑的理解，以及如何引進於中國哲學研究領域之相關議題的立場，請參見佐藤將之：〈日本學者追求「觀念史」研究的固有歷史脈絡與三個契機〉，《東亞觀念史集刊》，集11（2016年12月），頁3-21。

19 「天下型國家」一詞為渡邊信一郎所提倡使用的概念。請看本書第八章相關論述。

盡可能找出兩者特有的思想特質。筆者也注意這些概念在《荀》、《呂》實為含有多層次涵義的事實。關於兩書如上概念的多種涵義，本書對各個概念的語義區分成四種：

- (一) 從表面的文字層次（具體語義）
- (二) 論述層次（主張內容、比喻的效果等）
- (三) 在個別主張背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層次
- (四) 在闡述理路上或思維方式上的層次

經由分析注意這些概念的多層意涵，我們將會發現《荀》、《呂》之間在使用同樣概念而呈現實為不同的主張，或表面上由不同概念來論述的內容，實際上是相當類似的種種情況。因此即便《荀》、《呂》的主張之間有很多差異，可能僅是實踐方法上的差別而已；兩者主張的目標、其核心價值等之間，並沒有那麼大的思想衝突。²⁰ 藉由如上探討來獲得對《荀》、《呂》思想特質之理解，本書將進一步對如下兩個問題提出拙見：第一，兩書內容對當時歷史的「戰國狀態」之終結所發揮的可能實際影響；第二，兩書所構想的國家社會之理想藍圖中，可能成為秦漢以後實際出現大一統王朝的國家和社會淵源性之思想特點。

三、本書架構

基於如上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本書構成和各章論述概要如

20 丸山真男：〈思想史の考え方について——類型、範圍、對象〉，武田清子（編）：《思想史の方法と對象：日本と西歐》（東京：創文社，1963），頁3-33；此文也有中譯，收錄於丸山真男（著），區建英（譯）：《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頁176-197。

下。本書除了序論和結論之外，由總共八章的論述構成。關於章節構造，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論述是針對過去相關研究的綜合評述，及《荀》、《呂》（尤其是後者）出現的歷史背景之說明。第四章到第八章則是按照如上所分類的「倫理觀」、「人類觀」、「秩序觀」以及「天下觀」的四個議題，闡述兩書的主要諸概念和思想特色。各章論述方式是接續上述討論而釐清諸概念在此兩書的涵義，與其他戰國文獻中同一或類似概念的涵義之間的異同。我們當然也關注探討這些概念在《荀》、《呂》兩者之間的異同。如上也曾提及，為了闡述如此觀點，筆者在過去研究中挑選「誠」、「忠」、「人」、「群」、「欲」、「染」、「漸」、「理」、「公」以及「天下」等十個概念，²¹ 期待藉以對於《荀》、《呂》用例中諸概念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能夠呈現過去研究比較沒有注意過兩書相當重要的思想特質。

各章問題意識和具體探討內容如下：

第一章為「《荀子》和《呂氏春秋》比較研究之可能性」，進行比較研究《荀子》與《呂氏春秋》思想的基礎作業。本章評論傳統知識分子和當代學者所認為的《呂氏春秋》文獻性格和思想特色的觀點；也整理當代學者對《荀》、《呂》比較思想研究的情況。本章首先指出，過去的研究理解《荀子》與《呂氏春秋》時有兩種「非對稱」的評估態度：將《荀子》視為具備個人特色著作的態度，及將《呂氏春秋》只作為顯現混合思想的彙集之態度。這樣的預設也會導致學者將《荀子》和《呂氏春秋》之間類似或共同的思想內

21 不過其中關於「忠」和「理」兩個概念，由於個別在《中國古代「忠」論研究》第四章第一節的「《荀子》的『忠』觀暨『忠信』觀」和第二節「《呂氏春秋》的『忠』觀」（頁133-161），以及《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和戰國諸子的研究》第五章的「效法天地秩序和體現文明秩序的帝王：《呂氏春秋》與《荀子》的『禮義』」（頁177-235）中提供具較有系統且詳細的論述，本書在此僅提供其論述之要點，懇請讀者諒解。

容，看作《荀子》對《呂氏春秋》的單方向之影響。筆者則以「綜合」和「統合」的視角為切入點，探索克服此研究困境的方向。換言之，發現《荀》、《呂》之間思想上的差異時，所要關注的問題應該不在於兩書接受哪一家的思想；而是各自以何種理路「綜合」或「統合」戰國諸子的各種思想成分，建構出治理「後周魯時代」的天下之藍圖。

第二章為「『後周魯時代』的開始與欲升天子的秦王」。本章經過對在《史記》、《戰國策》以及《韓非子》中秦國對外問題相關的記載和論述之分析，試圖探討前256年發生的周王室之終止和魯國的滅亡為契機所出現的歷史情況，並藉由將其理解為「後周魯時代」，來重新詮釋此三十五年間秦國的動態之歷史意義。本章探討可分成兩部分。在前半，筆者推論：秦國攻滅周朝之後雖然還是繼續擴張其領土，但秦主同時也努力將自己的地位從「*de facto*」（發揮實際天子般角色的）天子，提升為名正言順的新天子。為此，秦廷似乎仍追求「間接支配周邊諸侯和天下人民」的統治模式。然而，進入前230年代後半，隨著李斯掌權，或許也由於為了對付趙國的問題等，秦廷對外政策從如上模式轉換成為直接攻滅諸侯。因此，所謂前221年「一統天下」應該並非秦國歷來自然推行的政策，而是前230年代政策轉換的結果所產生的歷史新局面。

第三章為「『後周魯時代』的秦國與《呂氏春秋》的登場」。本章探討《呂氏春秋》一書登場的歷史背景和撰寫動機，以及其內容是否受到《荀子》思想影響。筆者針對如下兩個主題進行論述：第一是呂不韋為何要編輯《呂氏春秋》的動機。由於《呂氏春秋》的登場是以周王已不在的「後周魯時代」開始為主要背景，其目標應該是將治理天下人民的統治理論提供給秦王。就《呂氏春秋》作者們而言，藉由此統治理論的實踐，使得秦王能從當今「*de facto*」天

子，提升為真正的天子。第二個探討主題則為《荀》、《呂》之間是否彼此有思想影響。筆者的想法是兩書論述內容基本上應該各自展開，只是呂不韋可能繼承荀子所要展開「如何治理天下人民」的論述之問題意識，並將這樣的論述轉換成專為秦主實踐的一種「行動計畫」(action plan)。

第四章為「治理天下人民的倫理學說：《荀子》與《呂氏春秋》的『誠』與『忠』概念」。經過《荀》、《呂》之「誠」、「忠」和兩個概念的內容及其論述的角色分析，筆者欲論證荀子和《呂氏春秋》的作者（或編者）均堅信此兩個倫理價值的實踐，是為了建立治理天下的國家不可或缺之條件。具體而言，《荀》、《呂》的「誠」論和「忠」論乃針對戰國中期後思想趨勢，提出以下三個觀點：一、更具說服力的倫理學說之重建；二、將「超乎地域性」和「非語言」涵義賦予倫理學說；三、提出合乎倫理需求且實際可行的統治術。在此我們能夠確認《荀子》的政治學說絕非只是為了鞏固「君權」所提出，其所志在於提出合乎倫理原則的天下秩序構想。這點對《呂氏春秋》的倫理學說也相同：它未必只是為了協助對秦王單方面有利的君臣關係建立而提出，也未必代表秦國特有的政治文化情況。

第五章為「『人類相同』思想之展開：《荀子》與《呂氏春秋》的『人』觀與『群』論」。前章透過「誠」和「忠」兩概念的分析，觀察《荀》、《呂》均一致認為為了終止當時的戰國狀態，以「誠」和「忠」兩概念來建立新的倫理學說。本章則將探析《荀子》、《呂氏春秋》如何思考為了建立包含天下所有人民的國家理論之前提。為此，本章將關注《荀》、《呂》相關論述如下三點思想特徵：第一，兩書所提出對人類的理解並非屬於個別族群或階級，而是具備同樣身體功能和異於其他生物的各种特質之整體人類。其他

先秦文獻中，「人」概念的涵義不如《荀》、《呂》那麼清楚界定。第二，兩書的養生論也基於全人類的身體功能相同之前提而展開論述。第三，「國家起源論」的探討中，兩書基於對人類身體功能限制的理解而發展出「群」論。基於如此對「人」的理解，兩書政治主張的重點從治理「某個地區的人民」或專屬被統治階層的「民」，變成「生理屬性上具備一樣特色的總體人類」之轉換，且治理對象的「人」還包含統治者本人的身體。

第六章為「《荀子》與《呂氏春秋》『同類相應』和『染』的思維方式」。本章探討《荀》、《呂》如何思考「人」和「人」之間正、負面影響的問題，並經由對如下三個問題的討論，試圖呈現兩書思維方式上的特色：第一，兩書所具有的「類」概念，尤其是以「同類相應」呈現的思維方式；第二，《荀子》「漸」概念和《呂氏春秋》「染」概念；第三，兩書論述中由「同類相應」的思維方式所呈現出的「禍福」觀及「天人關係」觀。這樣的「人」觀一方面都強調人類對善行的主動努力，另一方面也認為事物與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某種程度上與每個人所為之善惡結果連動。因為如此法則所產生的影響應該並非只針對住居於某個國家的人或屬於特定人群，而是能影響整體人群。筆者認為此種思維方式的提出也能使得兩書的論述具有能治理整體人類的意涵。

第七章為「體現秩序的原理與其落實於人類世界：《荀子》與《呂氏春秋》的『理』與『公』概念」。本章先欲點出《荀》、《呂》「理」概念提供建立涵蓋全天下的國家之秩序原理。接著在「公」概念的探討中，則試圖論證其在與由「理」等概念界定的秩序原理落實於治理天下全部人民的具體方策上，發揮概念功能。《荀子》「公」論的思想意義，應在於將原來只有聖人般的最高統治者能達成的秩序原理境界，「開放」給中間統治層的「士」達成，甚至降及於一

般人民；相形之下，《呂氏春秋》的「公」概念則只是最高統治者首要實踐的德目。正如〈貴公〉開頭所說，此德目就是天子達成養身之後所要向天下實踐的。《呂氏春秋》的作者藉「至公」一詞概念來讚美堯舜的禪讓行為，如此一來，剛登上天子之位後第一件要做的，理論上就會變成放棄君位！是以，《呂氏春秋》的「公」概念在實踐上存在著相當難緩的思想張力。

第八章為「《荀子》和《呂氏春秋》的『天下』概念：『後周魯時代』世界的地理和統治範圍」。筆者針對《荀子》和《呂氏春秋》中出現的「天下」及「四海」等相關概念用例，進行詳細考察。本章要論證的是，戰國諸子文獻中《荀》、《呂》所呈現的政治思想特色，異於其他戰國諸子文獻的論述，主要意圖在於某一國家，即所謂「諸侯國」的富強。兩書政治理論的出發點並非單一國家的擴張，而是整個華夏世界的政治秩序，也就是「天下型國家」之建立。具體而言，筆者將試圖論證如下兩點：其一，荀子認為任何國君只要達成其所要求的人格特質，就能成為「天下之君」；其二，《呂氏春秋》所界定的「天子」，則是暗示秦主。因此，其論述主要鼓勵「天子」以「養身」、「求賢」、「至公」等較為「消極」的方式來獲得天下人民的擁戴。總之，秦漢之後的「天下」觀應該經過《荀》、《呂》理論化的過程，理論層次也好，實行層次也好，才提升為包含能長期安定地治理廣闊領土之視野的政治理論。

「結論」一章中，筆者先整理出由本書探討所獲得的《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特色，接著討論兩書思想對於當時時局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其限制的問題。最後針對荀子如何看待秦國未來成為「天下之君」的可能性提出若干鄙見，作為總結。荀子一方面以「暴國」、「末世之兵」等詞彙批判秦國的現狀，然而也在以他所提倡的「義術」之實行為前提，認為秦君充分具有資格在未來提升為「天下

之君」的可能性。

總之，從已知悉後面歷史展開的回顧觀點來說，前221年「一統天下」可被視為中國歷史里程碑之重大事件。按照此史觀，正如司馬遷的敘述，戰國一連串的歷史事件簡直如同只以前往前221年「一統天下」事件為歷史的「目標」進行著。然而，戰國時代當時的秦廷朝臣和戰國諸子思維中，前256年之後開始出現周天子消失的情勢也應該同樣是相當重大的事件。沒有周天子的情況下，當時壓倒性獨強的秦國開始以「*de facto*天子」身分與周邊諸侯互動，這就是整個華夏世界從未經驗過的局面，以司馬遷為首的史家都忘掉華夏世界經過如此「後周魯時代」的重大歷史意義。在此段「後周魯時代」，當時已成為「*de facto*天子」的秦王正為提升為名正言順的新天子，探索有效可行的方法，而《荀子》和《呂氏春秋》為從不同角度的「指南」，為此發揮某種的引導功能。然而前230年代隨著荀子和呂不韋的退場，戰國世局和時代思潮均由比他們年輕一代的李斯所提倡的「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李斯列傳〉）方向取代。如此，《荀子》和《呂氏春秋》在戰國時局的歷史任務也到此告個段落，等到漢朝重新建立新的大一統國家時，兩書也重新受到重視，並再度發揮與「後周魯時代」不同的思想角色。